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聲週報

第十二八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份三分全年運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廿一年六月十二日出版

民聲第廿八期目錄

近事雜評

- 一、爲廢止內戰運動者進一解 常燕生
 - 二、憑弔吳淞戰場雜感 舜生
 - 三、歡送十九路軍赴閩勦匪 關文
 - 四、廢止內戰聲中之南粵風雲 夏雨時
- 告主張對俄復交者並質陳彬蘇君 陳啓天
上海協定的詳細分析 丁作韶
中國民主憲法議(六續) 徐漢蒙

黃皮小叢書之三民主義批判

實價五角郵費加一本社代售

贈書

本社代贈國家主義淺說及中國青年黨過去與現在兩書，函索請附郵費三分半，即各寄一部。

近事雜評

一、爲廢止內戰運動者進一解

常燕生

中國的苦於內戰，不是自今日始的，廢止內戰的運動，也不是自今日始的。民國十一年秋間，齊燮元與盧永祥在蘇浙對峙的時候，蘇浙兩省人士曾發起和平協會，進行停止內戰的運動，結果有蘇浙和平公約的簽定。兩省長官都正式簽字在上面，不久又有贛浙的和平公約簽字成立。雖然都是局部的停戰運動，但是一時聲勢煥赫，頗有內戰從此永絕，人民可以共享昇平的樣子。但事實上和平公約簽字後剛剛一年蘇浙間的戰事仍然還是爆發，像煞有介事的和平公約竟不會發生一點效力，這是九年前第一次廢止內戰運動的失敗的經過。現在，經滬平各地資產界領袖的提倡

，國民黨政府領袖和黨部有形無形的幫忙，廢止內戰的運動又突然高唱起來了，鑒於歷史上失敗的經驗，我們對於主張廢止內戰的人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作進一步求實際有效的辦法的研究。

在近二千年來，受傳統的苟安保守思想陶冶的中國民族，是世界上最愛和平最反對戰爭的民族，近二十年來，受國內戰爭的苦痛，及歐戰後非戰思想影響，越發的表現這種非戰的精神到了十二萬分。這種根本非戰精神普及的結果，就是對國防上一無準備，對外侮之來一無抵抗，以致睡手而失去東北三省。我們知道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不靠武力的擁護能夠立國。

存的。從社會學的見地看來，戰爭並不是根本有害的事情。戰爭是淘汰民族惡質，改良民族道德的有力工具，在充滿腐敗，自私，苟安，畏縮的老大民族裏，只有靠一次或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才能根本刷新民族的惡點，創造民族的新精神。人類中最美最善的集團道德，只有在對外戰爭時才充分表現出來。這種道理，在以前個人主義化的中國人是根本不了解的，經過這次十九路軍在上海的一月零四天的抗日作戰以後，中國人才漸漸明白了戰爭對於民族的功用。

自然，這種對於戰爭的有利的評價，是專指對外戰爭而言的。若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間自身發生了內部的戰爭，無論所持的理由為何，總是很悲慘不幸的事情，為國家的秩序安甯起見，應該根本消弭這種不幸，這是無疑的。但是感情上的贊成與反對是一件事情，事實上的發作與制止又是一件事情，世界上凡是發生一件問題，總不會是全然無因而來的。內戰是一件重大的社會事變，他的發生一定有必然的原因，不能僅僅認為是一兩個主動人物的衝動行為。即在最卑劣的軍閥私鬥，也必然有他的社會的背景作原因，一個過利而無法容納的私人軍隊，一個財政的危機，一個軍隊統制和待遇的不平，一個政治組織的畸形發展，都可以促進軍隊私鬥的發生。

對這些原因不謀根本的救濟，單說廢戰是等於畫餅充飢，蘇浙和平公約的失敗，就是廢戰運動者前車之鑒。

內戰也不是全然無意義的事情，在政治和社會上發生了不平和腐化情形的時候。依法律軌道不能解決或根本就沒有法律軌道可循，以至被壓迫的國民不能不忍痛從內戰中為國家民族求總解決的途徑，這種內戰是有意義的，這種內戰是根本不應該反對的，這種內戰就是革命。在國家社會的進化途徑上，革命與和平佔同等重要的位置。即以二十年來中國的政治而論，若不是有丙辰護國倒袁的內戰，若不是有丁巳討伐復辟的內戰，則中國國家的進化當要受到何種的影響？這是反對內戰的人所應該首先謹慎分析出來的工作。

講到根本制止內戰的實際辦法，更是廢戰運動者所應該切實想到的。戰爭是一件實際的事變，靠宣傳式的宣言，標語，通電，不能制止了他，靠會議式的集會，演說，提案，表決，也不能制止了他，靠宗教式的祈禱，宣誓或者友誼式的絕交，不合作，也都不能制止了他。戰爭是一種實際的力量，要想制止他，還須要想出的一種更實際更有力量的辦法。

英國是廢止內戰最早的國家從克，林威爾的專政結束以後，差不多有二百七十年不聞內戰了。一六八八年的榮譽革命

，一七六〇年以後喬治第三的專權，一八三二年的國會選舉改革案，都有可以引起內戰的機會，然而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了。這裏邊並沒有什麼別的奧妙的法術，英國人惟一的長處，就是對於轉換戰爭方式的覺悟，比別的民族早一點。

什麼是轉換戰爭的方式呢？一個廣土衆民的國家，個人與個人間，部分與部分間，意見的爭執，權利的衝突，是絕對無法避免的。妄想統一切不同意志，取消一切衝突的爭端，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惟一的辦法，就是使這些意見與權利的衝突爭執，用比較不流血的方法表現出來，用選舉票代替機關鎗的辦法表現出來。這不是根本廢止內戰，戰爭是人類的天性，無論對內對外，永遠不能廢止的，唯一的可能方法，就是廢止用機關鎗決勝負的內戰，改改用選舉票決勝負的內戰。在民治國家的統制之下，每年每月每日每時都有極劇烈的內戰發生，國會內黨派的舌辯，報紙上輿論的筆戰，選舉期內空前的政治競爭，以至於捧茶碗，扔墨盒，打家毀舍，示威遊行，一些小小的紛亂，都是國民練習內戰的機會。因為這種參加內戰的機會太多了，所以國民不需要有他種方式的內戰，不需要以機關鎗來代替口舌紙筆。他們有政見的衝突嗎？好，到選舉場上去！有權利的追求嗎？好，到選舉場上去。想把持一

國的政權的，想得到權勢與地位的，想報仇的。想陞官的，想出風頭的，都一齊到選舉場上去決鬥，到議會席上去決鬥，一次失敗了，下次再來，這種內戰是理與力的結合，是秩序與鬥爭兩種人類天性的調和，是不妨時時刻刻舉行的。這種內戰無論激烈到什麼程度，不至於流多數人民的血，蹂躪多數人民的財產，破壞國家的秩序，動搖國家的根本。這就是民主主義的唯功效。

自從英國人發明了這種不用槍砲的內戰方法後，凡是有覺悟的民族，都跟着他的路走，都同樣的得到好處。只有那不長進或者故步自封的民族，才忽略了這種方法的重要性。不根本從政治制度上着手，替內戰轉換一條新路徑，但高唱廢止內戰，是永遠不會發生效力的。在一黨一派和一個私人系統把持的政治局面之下，希望別的人不起來反抗。不用機關鎗去達到他們的要求，這種事情只有在摩爾的烏託邦中或者會存在着，現代的人是不會有的。提倡廢止內戰運動的人們，你們惟一的任務，是應該想法替政治鬥爭開闢一條和平民治的新路。只有這個辦法，才可以停止機關鎗式的內戰。民治的軌道一日不建立，內戰一日不要想望倖免的。

幾年以來，中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投機取巧的關係，以鉅大的財額無限制地供給

贖武軍閥做他們的挑動內戰武力統一的後盾，製造這幾年來內戰的主要關係人，就是這一般新中國的資產階級，現在資產階級覺悟了（？）也來公然主張廢止內戰的運動了，這不失為一種對國民贖罪的方法。但是在現在畸形的政治制度之下，若是廢止內戰僅當作維持現狀講，就無異於替把持政權的一黨一系做保鏢運動，這種保鏢運動的結果，勢必更加倍惹起社會的不平，

一、憑弔淞滬戰場雜感

三個月前中日兩國決鬥的淞滬戰場，我一直到昨天才去憑弔了一次。我所到的地點，為閘北，江灣，吳淞。這一帶地方的緣故，每星期照例要去兩次。現在舊地重遊，回想從前的繁華景象，簡直如置身另一世界了。

在我未參觀戰場以前，我有一種幻想：我覺得以閘北一帶的繁盛，以上海資本家之善於投機，大概有一年的工夫，即不難恢復戰前的原狀。經了這次實地的踏勘，才知道殘破竟到了這種程度！以上海目前市面這樣的不景氣，以政局的時時不安，以日本和列強關係於自由市的種種謬說，恐怕就是五年十年，也還復恢不了。

帝國主義之應該打倒，尤其日帝國主義之應該首先打倒，這是毫無疑義的！我

更加倍製造內戰的種子，以這種目的來鼓吹廢止內戰，無異於南轅北轍。如果主張的人真是有廢止內戰的誠意！應當根本接受我們上文所提到的主張，而努力促其實現。我們上文的主張，總括起來，就是：
欲根本廢止內戰，須自建設民治的政治鬥爭軌道始。

舜生

希望上海和上海附近的居民，大家都到閘北，江灣，吳淞一帶去看看，以堅實自己的這種信念。

老實說：在去年九一八事變以前，我或許在一般的中國人中，算是一個對日本抱得有特別好感的：我歡喜日本人的自殺殉愛之風，我歡喜日本人的清潔而有秩序的，我覺得日本人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古中國的文化，我也未嘗不佩服日本人吸取近代西洋文化的猛勇，甚至為一般人所不羨或難的，日本女子，乃至為一般人所不羨或難的，日本女子的服裝，我也不知道為他們作過多少次的辯護。

現在完了，現在一切都完了，日本人在東北充分發揮了他們的獸性，在淞滬充分發揮了他們的獸性，我已經發現日本不僅是中國文化的罪人，同時也是西洋文化

的蓋賊！如果全世界的人不羣起對日本加以一種有力的制裁，則日本不僅是中國的禍水，同時也一定要予全人類以一種威脅！并且這種威脅的到來就在最近的明天！

日本軍隊破壞北火車站，破壞開北一帶的民居和市場，甚至炸燬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或許還可以藉口戰略上的需要，至於炸毀持志大學，商科學院，法學院，中國公學等等，則除卑劣的獸性發作以外，我實在找不出有何種的必要。

吳淞砲台，以前是禁地，我們從來沒有參觀的可能，這一次算是盡情的看了一個痛快。我對於要塞的建築和砲的種類雖然是門外漢，但我看了這樣顯露的砲位，這樣笨重的炮身和炮彈，我相信這是十九世紀甚至還是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把戲！炸毀了，便算完事，我對這些是毫不覺得可惜，因為早就應該拆去重建的。但假如日本人或將來的所謂的圓桌會議，有人提議要援辛丑條約中國不得在大沽一帶重建砲台的先例，以之適用於吳淞，這是應該大家起來反對的。

在蘆漢濱的附近，有由日本工兵建的一座木橋，居然大書特書曰「白川橋」，白川，白川，固一世之雄也！同行的朋友們主張把這座橋毀去，我覺得暫時保留給予中國人一個較深的刺激，同時暴露日本軍閥的罪惡於同情中國的友人，也未始不可。

戰區一帶的人民，已經有許多齊集在頹垣斷瓦中，去支持他們劫後的餘生；在楊樹浦一帶，仍然有一大羣一大羣的女工，不能不到日本的紗廠去做她們可憐的生活；從租界跑來參觀戰場的摩登小姐們或

二、歡送十九路軍赴閩勦匪

最近報載，十九路軍已被派調閩剿共了，命令已下，部隊亦開始開拔了。他們的程序大概是六十一師先開，其次是六十師，其次是七十八師；從頭到尾，大概得經過一個月，許多民衆團體因爲不明瞭十九路軍和政府的關係，不明瞭十九路軍眼前的處境，不明瞭十九路軍本身的要求，只憑着一腔擁護的熱情，自從聽到移防的消息起，一直到現在，陸續地繼續地向中央和十九路軍請求和挽留。在他們的意思，大概以爲十九路軍勞苦功高，京滬線是最好的駐兵地帶，應該讓十九路軍久住下去，其次則是懷疑十九路軍之移防，爲中日協定中的條件，再次則是一種私愛，對着這兩三萬精忠爲國的健兒，實在捨不得他們跑開。這種熱心和至情是極可感念的，但若他們明瞭十九路軍素來的抱負和前途的使命，他們決不肯再在那裏挽留，以致貽誤勦匪的工作！

照我們所聽聞，十九路軍之援閩，一

太太們，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似乎感得一種特殊的興趣；那些北四川路一帶門前冷落的日本小商人，我從他們的面孔上，似乎也看得出一種不自然的憂戚；凡此種種，都給了我一些很深的印象。

聞夫

面出於中央的命令，一面也是十九路軍自己的請求。

十九路軍素來的抱負是只爲國家打仗的。對外禦侮也可以，對內勦匪也可以，但決不願參加軍閥的混戰。現在上海已經停戰，日本大概再不必用武力來侵犯，因爲黨政府早經投降了。長留在京滬線上，既沒有事做，反而足以散懈軍心，敗壞軍紀。開到東北去罷，又有重重阻隔，決不能違他們繼續禦侮的志願。而福建正苦赤禍滔天，到處請兵援救。勦匪也是爲國家打仗，如同禦侮一樣。況且勦辦赤匪既是平定內亂，救民於水火，又是抵禦外侮，防俄於江海。這種重大的使命尤其合於十九路軍的抱負。挽留十九路軍不去，便必致影響前途勦匪的工作。說到這裏，從十九路軍移防的消息開始傳開來時，我們就不必過於挽留。至於現在十九路軍已經開始移動的當兒，若再挽留，那真是危險極了！譬如講，六十一師開走了，六十師亦

開走了，那時中央忽然接受民衆團體的意見，把一師留在後面，那怎麼辦呢？那不是使十九路軍的兵力分散，致已經赴閩的一部分部隊對於勦匪的工作不能迅速的順利進行嗎？既使十九路軍損失軍威又使共匪得以坐大，人民不更苦嗎？我講這話並不是杞憂，這是完全可能的！我不單要民衆明瞭這一點，並且要十九路軍本身注意這一點！我們試看一看今天（七日）的申報，就知道我的話是有根據的了：

「蘇，錫，粵，各界挽留滬抗日軍代表團方道安等十餘人五日晉京……分謁各營局……遞呈請願……軍政部表示，允向軍委會聲請，酌留十九路軍駐原防，以慰民望。」

所謂「酌留」，就是留一部分，就是把十九路軍的勢力分散，不能用全力去勦匪！你們是愛護十九路軍，希望牠整個團結，以爲國家禦侮或勦匪，但你們的好意，却有產生極壞的結果的危險。倘如這樣的事竟至發生，則你們將自責不暇，這是如何可痛心的事情！

那末，現在應當怎樣辦呢？就是應當送十九路軍赴閩剿共！歡送十九路軍「全軍」赴閩剿共。倘若不幸而言中，有人想把一部份留在京滬線，無異阻軍養匪，就應當力爭，請願通電都任便，讓十九路軍整個的去！現在是：

不要在那裏強挽留！

四、廢止內戰聲中之南粵風雲

廢止內戰的呼聲，總算遍及全國了，由上海，而南京，而天津，而北平，而漢口，而濟南，而廣州，甚而至於海外僑民，也有通電響應的。既然有要人及重要團體唱之於前，又有各地團體及要人和之於後，這齣戲，自然非演一演不可了。

然而我們最担心的，就是這齣戲恐怕還不會出臺，而廣東的一齣龍虎鬥就要先開幕，這不但使一班熱心廢止內戰的先生們有點難堪，使我們觀衆也有一些掃興！

自陳濟棠改編海空兩軍，引起海軍的反抗後，爲時已經不少了。中間雖經胡漢民等的調停，由緊張而趨於和緩，但據近日報載，似乎又由和緩復趨緊張，一方面陳濟棠決心對瓊用兵，一方面陳策更派艦佔據合浦，截留稅收，大有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在這廢止內戰的呼聲高響入雲的今日，竟有如此現象，我們實有不盡的感慨！

我們不想在他們之間評判什麼是非曲直，但我們要指出的是：他們雙方都是國

歡送十九路軍赴閩剿匪！

雨時

民黨的忠實同志，他們雙方都是以軍隊爲私產的軍閥。他們如果發生戰鬥，除表面的原因外，還有兩種重要的原因：一是國民黨領袖間的暗鬥，藉此爆發；二是軍閥制度的作祟。

何以說國民黨領袖間的暗鬥藉此爆發呢？因爲國民黨現在不是一黨專政，而且是一派或一人專政，在一派或一人專政之下，被打倒的別派，自然只有運用武力以奪取一部或全部政權。廣東表面雖是二陳之爭，其實背後尚大有人在。

何以說軍閥制度作祟呢？因爲軍閥是以武力爲私產，只知擴張武力或保持武力，他非所問。勢力大點的就想擴張，勢力小點的就要求保持。擴張與保持相衝突時，就不免出於一戰，所以宣言不參加內戰的空軍，也不免分裂爲二了。

所以我們在前期曾經指出：不根本破壞軍閥制度，不徹底取消一黨專政，內戰是無法廢止的！廣東二陳之爭，不過給我們一個證明罷了。

（六月七日）

陳啓天

告主張對俄復交者

——並質申報記者陳彬蘇君——

中國以蘇俄利用使館領館藏匿，供給並指揮共黨暴動於十六年十二月宣告絕交，到現在已有三年半的時間。在絕交中俄國曾於十八年用飛機大炮進攻中國，造成中東路戰役，強使中國簽訂伯力協定，中國因此喪權辱國，與現在的上海協定實不相上下。照伯力協定，中俄兩國派代表在俄京會議，協商中東路通商及復交三大問題。這個中俄會議實早已包含討論中俄復交的問題。然以俄政府的刁難和推延，致中國代表團莫德惠等滯留俄京兩年，毫無結果，甚至連會也不會，自然談不到復交。不過到了去年九一八以後，以中國大受日本的武力壓迫，黨國要人如汪精衛陳友仁曾放出對俄復交甚至聯俄的空氣，於是引起對俄復交問題的討論。記者於去年十月卅一日在本報第五期上曾發表「抗日中的對俄復交問題」一文，從日俄的關係，俄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與俄絕交的歷史，中國國內的共匪形勢四方面詳細說明中國在目前尚不宜對俄復交，並且在該文的開宗明義便表明我們立論的根本態度如下：

「我們且不問主張對俄復交的是什麼人，也不問主張對俄復交的人之真實背景是怎麼樣，但我們必須考究對俄復交與中國的利害究竟怎麼樣。在國際間，縱橫捭闔，只須以本國的利害為前提，

原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今天與甲國相聯以抗乙國，明天又與乙國相聯以抗甲國，這本是極尋常的事件。如果中國對俄復交甚至聯俄確於中國有利，本不妨復交或聯俄，以渡過目前的難關。如果對俄復交甚至聯俄，並不足渡過目前的難關，而且足以增加國家的危險，那就非堅決反對不可。」

此文發表之後經過半年，雖間有贊同或反對的調論，但很少詳細說明正面或反面的理由的。因此本報也就未再加討論，不過到現在政府方面似乎已有對復交的傾向（外交部負責人員前後關於對俄問題的表示便是証據）同時人民方面也有堅決主張對俄復交的。究竟立即對俄復交於中國有利還是有害？於中國是利多害少？還是利少害多？在未實行復交以前，我們還應從長討論一下。最近主張對俄復交最力者，恐怕要數申報記者陳彬蘇君罷。他在申報上一連做了五篇時評，（見註一）用很肯定的語氣說：「吾人力主中蘇立即復交，」（見註二）「吾人力主對蘇復交，並深盼當局打破一切之阻力，斷然促其實現。」並且指斥反對中俄復交者為「過慮」為「短見」，為「怯懦」，為「苟安」，為「保守派」，為「似是而非」，為「似多偏重感情之偏激之言而少平心靜氣沉着踐實之論」。以素稱「過慮」，「怯懦」而且

「保守」的申報而有這樣堅決論調的時評，我不能不佩服陳彬蘇君的勇氣！不過陳君的主張，究竟對不對，我們認為還大有討論的必要。大晚報記者曾虛白君曾與陳君再三討論，我們也不妨加入戰團，妄參末議。在未加入戰團以前，我們要與陳君約定兩事如下：

第一無論主張如何，必須以中國本身的利害做根本原則。詳細的說，必須看明立即對俄復交於中國是利多害少，還是利少害多。利多害少則不妨立即復交，害多利少則萬萬不宜立即復交。反正的主張都須以國家的利害做判斷的標準。

第二無論主張如何，照陳君所說，「對此問題都平心靜氣，切實討論」。陳君再不宜指斥反對中俄復交者為「短見」，為「保守派」；我們也決不指斥主張中俄復交者為「衝動」為「投機派」。雙方自行壓下感情的論調，然後才能使人明瞭討論的結果。

一、所謂新的外交方針就是對俄復交嗎？

自暴日佔領東北以來，太平洋的風雲益加緊張，中國的命運益加危迫。我們要緊張的風雲中將危迫的國運挽救過來，自然除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項上想基本的辦法以外，還須在外交策略上想輔助的辦法，這是無人可以反對的。因此陳君所

謂「從速樹立新的外交方針，以謀應付來日之大難」，在原則上我們也可以贊同。不過陳君所謂「新的外交方針」就是對俄復交嗎？還要聯俄呢？我們再三細讀陳君的五篇時評，好像是明白的主張復交，含糊的主張聯俄，而又怕人說他的所謂復交就是聯俄。陳君說：

「復交非聯蘇，尤非容共。但爲恢復普通之外交關係。此爲普通常識。吾人絕不應有若何之誤解。」

不錯，由普通常識看來，復交只是「恢復普通之外交關係」，不過由中俄的過去歷史與俄國指揮下的中國國內共黨形勢上看，對俄復交除「恢復普通之外交關係」外，還有其他的重要關係，留待後面再說。姑且假定陳君所謂復交只限於「恢復普通之外交關係」。那末，我們便要請問陳君只與俄國「恢復普通外交關係」就配稱爲「新的外交方針」嗎？更配「以謀應付來日之大難」嗎？如果說對俄只限復交，便足稱爲「新的外交方針」，更能「應付來日之大難」，則英美甚至用武力侵略中國的日本都早與中國有「普通之外交關係」，何以不能救中國的危亡？從前中國曾與俄復交，也不足以救中國的危亡，而反增中國的危險。可見只對俄恢復普通外交關係，決不能「應付來日之大難」，也不足稱爲「新的外交方針」。陳君或者也明白對俄只

恢復普通外交關係，並不稱什麼新的外交方針。所以陳君又說：

「試問我國今日在外交上與國何在？非完全陷於孤立之地位乎？處於如斯嚴重情勢之下，其將坐待強鄰之宰割乎？抑應從速樹立新的外交方針以謀應付來日之大難乎？今日我國當前之壓迫爲日本。新的外交方針自應以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保全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爲基礎。法既與日有諒解之說，英與意亦無力東顧，美日衝突，雖日益激化，美可引爲我之與國，但亦有鞭長莫及之憂。獨蘇聯爲太平洋問題中最應注目之一要角。自彼革命而後，且自動宣告放棄舊時代與我訂立之一切不平等條約，并地理上天然爲我之與國，蓋無可置疑。我對蘇聯復交，在外交之局勢上，可收互相依庇之效。德土交蘇聯而得以打破外交上之艱局，即其例證。以地大物博民衆之兩大，如一旦復交，則太平洋上之局勢，自爲之大變。故我國今日如不甘坐待宰割，則新的外交方針必以此爲基礎。」

這段議論中所謂「與國」，所謂「獨有蘇聯爲太平洋問題中最應注目之一要角，並地理上天然爲我之與國」，所謂「新的外交方針必以此爲基礎」，等等，簡直是「聯俄論」。決不僅是「復交論」。與國必須

先有邦交。復了邦交不一定就是與國。英美法日等列強，都與中國有邦交，但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算做中國的與國，甚至還有的俄復交，如只限於「恢復普通外交關係」便不能即引俄國爲與國；如認定「獨有蘇聯爲我之與國」，新的外交方針必以此爲基礎，便不是單純的復交論。至少，陳君所謂復交是聯俄的準備，不僅僅限於「恢復普通外交關係」而已。陳君所謂「新的外交方針」之應從長討論的焦點，不在單純的復交論，而在準備聯俄的復交論。說到聯俄或準備聯俄的復交，我們便不可忘却兩次的歷史教訓：第一次是李鴻章聯俄國教訓，第二次是孫中山聯俄的教訓。第一次聯俄的教訓比較遠點，還不大令人注意。第二次聯俄的教訓，如中國的孤立，黨國的分爭，共匪的猖獗等等由聯俄所促起的惡果，都還擺在我們眼前，我們就忘却了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我要勸勸陳君將聯俄的歷史教訓再細細想想，必可恍然大悟了。彷彿陳君已經知道聯俄的歷史教訓還存在一般人腦中，不便逕直提出聯俄的主張，只好寓聯俄的主張於復交的主張之中，以

蒙混讀者的視聽。我這樣說，過於深刻，或者陳君得難承認，那末我就要請陳君將名為復交實為聯俄的論調斟酌取消，以免立論不清，自相矛盾。

一、復交，聯俄與容共是截然的三事嗎？

由上節說來，陳君的論旨重在聯俄以樹立所謂新的外交方針，而其措詞又再三說明「吾人認為在討論此一問題之先，須認清『復交』『聯俄』與『容共』為三事，不容相提並論，」以求讀者免於誤解。不錯，照常識說，復交，聯俄，與容共確為三事，不是一事，我是認清了。不過此三事截然無關的三事，還是互有關聯的三事，我們在討論此一問題之先，也必須認清。復交，聯俄和容共之所以在形式上成為三事，因為各國與俄復交的不必聯俄，聯俄不必容共的種種事例，例如英國與俄復交但並不聯俄，土耳其與俄復交但並不容共。這可以使我们明確認清，用不着再三的說明。不過復交，聯俄，和容共絕對不是截然無關的三事，而是互有密切關聯的三事，不易為人明確認清。恐怕陳彬蘇君對於這點也未十分認清罷！容共必先聯俄，聯俄必先復交，這是他們必然的普通關聯，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的。而且在中國目前的特殊情形之下，一

經對俄復交，勢必趨於聯俄，甚至容共，他們更有特殊的關聯，不能視為截然無關的三事。何以這樣說呢？第一因目前全國人民莫不痛恨日本的橫暴，在自己本身上時想不出抵禦的辦法來，癡想找一個國來為我國應付急難。現在主張對俄復交的人們除極少數別有背景或有作用的以外，大概都為這種情勢所驅使。單只復交並不能打開中國外交上的難關，那末，復交之後，便不得不趨於聯俄。從前李鴻章的聯俄是想利用俄國抵制日本，反為俄國所利用，又不能抵制日本致造成日俄瓜分東北的形勢。孫中山的聯俄是想利用俄國打倒帝國主義，結果白色帝國主義尚未打倒，赤色帝國主義反因此深入腹地為禍未已。現在主張對俄復交和聯俄的人們，就其心理的動機說，多半仍不出李孫兩人的範圍，也不過想用俄國抵制日本。但是赤色帝國主義蘇俄所給予中國的致命傷，並不下於白色帝國主義的日本。日本製造偽國統治東北，蘇俄也曾製造偽國統治外蒙。日本用暴力侵略中國，蘇俄也曾用暴力進攻中國（中東路戰役）。日本在中國的邊疆用軍隊壓迫，同時蘇俄也用他的使衣隊即共黨在中國的腹地擾亂使中國對日的長期抵制有了後顧之憂。這都是事實。怎麼可以前門拒虎，後門迎

狼呢？更怎麼可以虎未拒走，即行迎狼呢？我們認清日前堅決主張復交者既多含有聯俄的傾向，而中國的形勢又有走向聯俄的危險。復交和聯俄確有密切關係。故我們堅決反對聯俄者也不得不堅決反對立即復交。

第二因為復交雖非等於容共，却大有助於共，這又是互有密切的關聯，為我們討論復交問題者所必須特別注意的一件重要事實。為明瞭這件事實起見，須從三方面加以說明。頭一方面，我們要明白俄國對遠東的外交政策是怎樣，特別要明白俄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怎樣？陳君說：

「蘇聯在目前亦由進取之外交政策，退而為防守之外交政策。如與土耳其，德國，阿富汗，里斯亞尼亞，波斯，立陶宛芬，法國等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這段話，有一半是對的，還有一半是不對的。對的一半在什麼地方？即最近幾年來蘇俄對歐美及日本各國確已由進攻的外交政策轉為防守的外交政策。因為從前曾經進攻，迭遭失敗並且引起反感，不得不退守。目前俄國機關報曾聲言願與侵略中國的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又曾聲言在不得已時，不惜在資本主義國中找與國以制日本。這都是防守外交的表示。

但是俄國對遠東尤其是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決不是防守的而仍是進攻的。或者更貼切一點，可用戰術上的名詞，表明目前俄國對華的外交政策，是防禦式的攻進戰略，或攻擊式的防禦戰略。

俄國自共黨執政以來即定下兩條所謂世界革命戰略即俄國的外交戰略。第一條戰略是向資本主義國進攻，聯合無產階級，從內部拆列強的台。第二條戰略是向亞洲各國（日本除外）進攻，聯合弱小民族，從外部搗列強的亂。第一條戰略，在各國試行的結果均相繼失敗。如俄在德奧意等國所策動的所謂社會革命，完全失敗。英國曾以俄國在英宣傳共產一度絕交，美國以防止俄國宣傳共產，至今尚未實行與俄復交。俄國感於此條戰略足以使其在國際關係上益陷於孤立，乃與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妥協，由進攻轉為防守，以免根本動搖。但是俄國所抱赤色帝國主義的野心，並未因此放下。乃用避實就虛，乘隙蹈瑕的戰略，移其攻擊的目標集中於中國，以圖赤化整個的中國。這個外交戰略的攻擊目標——中國，確是蘇俄外交政策的根本精神所在。中國是帝國主義的次殖民地，自然受一般人的痛恨，於是蘇俄便令共黨叫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煽動羣衆。

蘇俄又說帝國主義是中俄的共同敵人，那無異就是說中國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不但是為中國，同時也是為俄國。更明白點說，蘇俄在中國所指揮的反帝運動，是依據蘇俄對資本主義國家正面防禦，側面攻擊的外交戰略而來。蘇俄正面防禦列強，使其本身得以休養生息。側面攻擊中國，雖直接受害的是中國，間接受害的也有列強。蘇俄既以此戰略鞏固本國，又可以此戰略制擊列強，這不是一個新錦囊妙計嗎？為俄國設想只有此妙計為最妙。為中國設想呢？那就不免為俄國防禦式的攻進外交戰略所犧牲了。中國既為俄國外交戰略的第一道防線，而且是防禦式的攻進外交戰略，無論如何，俄國是敵底赤化中國的，除非中國不予以澈底赤化的方便。如果中國立即對俄復交，即是予俄國澈底赤化中國的方便，使其完全實現防禦的外交戰略，那裏是什麼中國的新外交方針？所以我說立即復交雖非明顯的容共，而實際却大有助於共。又一方面，我們要明瞭俄與共的密切關係。在蘇俄號稱共產（實際是國家資本主義）由共黨專政，俄與共有極密切的關係，且不必說。在中國的共黨也與俄

國有極密切的關係，這又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事實。共黨雖然加上中國兩個字做幌子，但實際他與俄國的不是中國的。這可從所謂中國共黨的來源，組織系統以及行動指揮三方面說明。共黨是俄國派人拿錢到中國來組織才產生的。沒有俄國就沒有像現在的共黨，縱有共黨也決不會變成俄國御用的工具。這是共黨的來源。共黨號稱屬於第三國際而第三國際在實際上是俄國的一個大工具。俄國要怎麼樣，第三國際就怎麼樣，第三國際要怎樣所謂中國共黨就怎麼樣。陳獨秀不服從就打倒陳獨秀。李立三不服從就打倒李立三。陳李都是共黨的首領，然而俄國賊一聲打倒，就不得不倒。這由俄國在共黨的組織和行動指揮上佔最高的權力地位。如果將俄國與共黨強分為兩個截然無關的東西，不是由於常識缺乏，便是受了俄國宣傳。俄與共既是兩個極有密切關係的東西，那末立即復交便不免為共黨張勢。目前共黨正是猖獗的時候，還可立即與俄復交為共張勢嗎？

再一方面，我們要明白一經與俄復交便須承認蘇俄在中國京都設立公使館並在各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更須明蘇俄的使館和領

館除普通的外交和保僑的使命外，還負有赤化中國的任務。關於

這一層我們只須看看從前的對俄復交的命令即夠證明。十六年十二月撤銷俄領的命

令說：「查國民政府統治下各省之蘇俄領事館及其國營業機關，恆爲宣傳赤化，藏匿共黨之所。……本月十一日廣州事

變驟起，共黨佔領省垣，斷絕交通，焚燬全市，肆行殺戮，皆由共產黨藉蘇俄領事館及其國營業機關爲發令指示之

地，遂致釀成劇變，勢若燎原。即其他各省地方，亦不無暴動之慮。本政府爲維持治安，預防蔓延起見，……應即

將駐在各省之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領事一律撤消承認。所有各省之蘇俄國營業機關一律勒令停止營業，以杜亂源

，而使澈究。」蘇俄利用使領館宣傳赤化，藏匿共黨，指揮暴動等是鐵一般的事實。在當初絕

交的時候，共黨不過只有小規模的暴動，到現在竟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擁槍十餘

萬，占地兩三省，（合湘鄂贛豫皖閩粵桂等省七大匪區而言）官軍竭兩年的力量，

尙未肅清一點，（官軍所以不能肅清的原因見民聲二十五期「由江西到湖北」一文）那里還可以立即對俄復交，又讓俄國

逼設使領館予共黨以供給藏匿和指揮的便利呢？

我們明了俄國的外交戰略是以中國做他的第一道防線，即是以中國做他的犧牲品，又明了俄國與共黨的密切關係以及復交後俄使館領館所予共

黨的便利，就可斷定復交雖非容共，却是助共。如果不贊成共產，就不宜於堅決主張立即與俄復交

。我與陳君有一日之雅，確知其非共黨，亦不贊成殺人放火的共匪，又何以這樣堅決主張立即復交，致予共以便利呢？大晚

報記者曾曾質問陳君說：「當初爲什麼要對俄絕交？現在主張復交是否已解決這些條件？」我們根據上文的討論，應該答復如下：

「當初因爲共黨利用蘇俄使館和領館指揮暴動，宣傳赤化，所以不得不絕交。現在因我國中的毒太深太大，已經暴發於全國，不宜又與俄國設使領館供共黨之用

，近於火上添油，揚波助浪，以速中國之亡，故目前尚不宜於立即對俄復交。」

但是陳君的答復，竟不是這樣。陳君說：「民十六我國對蘇絕交，政府所持之理由。爲「蘇俄主使並參加共產黨暴亂。破壞國民革命，不得不採取斷然之處置

。」民十八中東路一役，真如大公報所謂「亦本不應有」。見五月十九日社評再論對俄復交問題）但年來湘鄂贛皖閩

共黨勢力之日益披猖，實在對蘇絕交之後。東北一隅，十六年後對蘇仍互派領事，然而東北共黨勢力，並不如南方之

張大。則吾人殆不能不承認以對蘇絕交防遏共黨之政策，已完全歸於失敗。故謂絕交爲反蘇聯則可，謂爲防遏共產則不可。蓋事實已證明絕交實未能防遏共產也。

至於「現在主張復交是否已解決了這些條件」之問題，亦可不必費辭而解答矣。一九二七年英保守黨內閣小題大做，藉口所謂「阿柯斯房屋搜查」而對蘇絕交。迨一九二九年英工黨重握政權，即行復交。豈在保守黨內閣時代，遂無法防遏「赤化」之宣傳，而在工黨內閣時代，遂無所顧忌耶？反之保守黨內閣對蘇絕交，遂果真已使英國共產主義之宣傳絕跡耶？故吾人謂絕交爲反蘇聯則可，謂爲防共則不可，此蓋爲必然之理也。

讀了上段陳君的答復，我們不能不反問陳君者：所謂中東路一役當然包涵絕交與作戰兩事。搜查哈俄領館只是中東路戰役的起因。搜查的結果獲得蘇聯赤化中國的陰謀證據顯與中俄協定相違，不能說是「本不應有」。如果說中國搜查本不應有，

那末蘇俄利用領事在中國宣傳赤化反是應有的嗎？如果陳君又說我所謂「本不應有」乃指對俄絕交。那末我又告訴陳君：中國對俄正式絕交是在十六年。十八年中東路一役，不是中國又對俄絕交，却反是俄國先對華宣告絕交以爲武裝進攻東北的開山砲。這是俄國對華宣戰的絕交，何以反說中國「本不應有」呢？陳君將事實張冠李戴，致於薄於責人，厚於責己，在國際的關係上是不容如此的。陳君以「東北共黨勢力並不如南方之強大」證明「對蘇絕交防過共黨之政策，已完全歸於失敗」，理由也不充分。因爲：俄國赤化中國的計劃在東北主防守，在南方主進攻。東北有日俄對峙的勢力。如果先從東北着手赤化，勢必引起日俄的直接鬥爭，與俄國的外交總戰略不合。這是南方共禍盛於東北的一個原因。國民黨曾經聯俄容共，因此共黨勢力隨着國民黨由南而北。國民黨的勢力幾乎始終未達到東北，所以共黨勢力在東北不如南方。這又是一個原因。共黨勢力最盛的南方幾省如鄂贛皖豫閩等都是南京政府的勢力範圍而南京政府政治的腐敗，軍隊的混雜，實在東北之上，這是南方盛於東北的第三個原因。明瞭這幾種原因，就不能說南方匪勢之大，即足證絕交以防共之政策歸於失敗。只可說由於聯俄一着，中毒已深，絕交太遲，防不勝防。絕交之後，

又不竭力肅清，反日日造亂，予共匪以發展的機會，致成目前不可收拾的局面。如果再立即復交，爲共助勢，那必定更不可向邇了。

至於陳君對於「現在主張對俄復交是否已經解決了這些條件」這個問題，認爲「可不必費辭而解答矣」。由我看來，所謂「可不必費辭」的解答，顯然是無從措詞的解答，孟子所謂「詞窮知其所避」，陳君總算會道。由中國一逼逼到了英國。曾君所問的是中國現在對俄復交是否解決了這些條件，不是問的英國。中國與英國的情形不同。英國對俄復交的事實，決不能做中國也可對俄復交的充足證據。我且先說一個譬喻。例如張三是個身強體壯的大漢，李四是個千孔百瘡的病夫。張三可以涉水跋山，節風沐雨。李四只宜住在醫院，慢慢調養。如果有人硬勸李四學着張三去涉水跋山，節風沐雨，並且設問鼓勵說：「張三可以涉水跋山，你李四爲什麼不可以？張三可以節風沐雨，你李四又爲什麼不可以？」李四果真信了這個人的鼓勵，我想陳君必定說，李四誤聽人言，一定速死。張三可以說是英國，李四可以說是中國。英國是健全發展的西方強國，中國是外感內傷的病夫。英國的政治早上了民治的軌道，中國的政治還在黨治的筈上。英國軍隊是屬於國家公共的，中國的軍隊還是軍閥私有的

。英國國民生活很富，中國國民生活很窮。英國沒有受過聯俄的禍，中國早已中了聯俄的毒。英國共黨很少，而且沒有武裝勢力，中國共匪很多，而且已有很大的武裝勢力。俄國對英國的外交是防守戰略，對中國的外交却是進攻戰略。由這種不同情形看來，可以判定英國對俄復交與否，不足爲中國亦可對俄復交的佐證。英國可以對於對俄復交，也可以對俄不復交，均不足影響英國的國本。但是中國立即對俄復交既得不着有把握的好處，反而先受助長共黨；動搖國本的害處。這又何苦求！就中國目前情形看來，反俄即爲防共之一法。絕交固爲反俄，亦所以防共。這才是「必然之理」。陳君「所見，不亦太左耶？」陳君又以爲復交仍有方法防共以塞反對者之口。他曾說：

「邦交儘可恢復，而共產黨宣傳上可以正當之手段交涉制止，此兩事不能並爲一談。」

復交與防共雖不能完全併爲一談；但是復交之時，必須顧及有無方法防共，以免因復交而助共。陳君於此點告訴我們「可以正當之手段，交涉制止」。我要請問所謂「正當之手段」是什麼？照國際慣例，當然不外條約或協定等手段，決不是憑口說。十三年中俄協定早已有下條的規定：

「第六條 兩締約國政府互相擔保在各國境內不准有爲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並允諾彼此不爲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之宣傳。」

這條規定明明說不許蘇俄在華宣傳共產主義；然而八年來的事實：共產黨是由俄成立的，俄國在中國不但有與中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之共產宣傳並且還以暴力反對中國政府。於是協定成了廢紙，有交涉等於無交涉，中國要制止，俄國要宣傳。所謂「正當之手段」，其效果早已如此，還再可信賴嗎？

陳君對於以上一點 既不能予我們以滿意的答覆又撇開對俄復交與助共的關係不多說，而特別將其論點置在「中國現狀爲最適合於共產主義之泥土」上。他說：

「問題之重心，在於我國是否適合於共產主義之泥土，是否有足使共產主義流行之機會。如其有之，絕交奚益？如其無之，復交何害？置問題之根本不問。而欲以閉門政策，防遏共產主義之流入。吁！物已先腐，雖置之鐵匣，果能保其不生蟲耶？」

脫曰：「我國無堅強之統一政府，「嚴密之社會組織」，「穩定之人民生活，「無控制共產主義者之把握」，故不容步武列強大開門戶，讓「赤色恐怖之陰

謀者」，自由出入，是則吾人既已認定我國爲最適合共產主義之泥土矣。我國既有此泥土，世即無蘇聯，亦難保不有革命之事實爆發。歷史上之變亂，斑斑可考。不修明內政，不安定民生，而欲以對蘇絕交，爲防遏亂萌之手段，所見不亦太左耶？」

這段論調，仿佛又由「復交論」一變而爲「共產論」。我要請問陳君明確答復的：你究竟是單主張復交呢？還是兼主張共產呢？如果你既主張復交又主張共產，那我再同你辯論共產的問題。如果你只主張復交而反對共產，便不應如此閃爍的措詞，而且徒逞一面之詞，以清惑無知者的視聽，據說申報行銷十二萬份，至少有廿萬的讀者。像這樣大報的記者，似乎對於時評的立論措詞要特別謹慎而且說一句話便要負責任。陳君！你是一個新興的名記者，望你珍重前途，多多爲國民造福，免得將來失悔。這是我一片善意的忠告，希望陳君諒納。六年以前，該有多少人爲共黨捧場，然而結果怎麼樣呢？即以陳獨秀君而論，他不是宣傳共產最力，主持共黨最久的人物嗎？然而俄國以他不贊成暴動政策，便說他是「機會主義者」，「取消主義者」，將他除名。如今共匪不認他做共黨，只落得與少數失意的同志躲在租界上，偶然發出悲哀的呼聲；俄國將他利用完了，便要

打倒，以免尾大不掉。我算爲他叫屈，徒然做了俄國的犧牲品。我又爲他可惜，誤盡許多熱烈的青年！吾友憚代英君，與我有十四年的交情（元年十四年）深知其能說能幹，實在是共黨中的一個頭等脚色。去年他從湖北到上海來調解共黨的內部門爭，竟爲其同志告密陷害而死。他臨死前，曾告某君說：「我死了也好。像現在的所謂共產與我原來的理想不知相去幾萬里。黨內的黑暗和爭奪，實在令人看不上眼，又令我左右做人難，到不如早死了的好。」我聽到這個消息，深深爲他可惜，好一個人，徒爲俄國所犧牲！

我說話似乎離了題。現在再回過頭來與陳君討論：假定「中國現狀爲最適合於共產主義之泥土」，究竟否立即對俄復交？在未討論此問題之先，我們要認清中國共匪猖獗原因有兩大類：一大類是因內，從內部起來的即陳君所謂「泥土」之類，又一大類是外因，從俄國打進的，即俄國利用復交的種種方便策動共黨的進行之類。我們要挽救中國，肅清共匪，必須同時內外兼營，標本兼治。如果只防外不防內，那固是如同置腐物於鐵匣之中，終久要生蟲甚至朽壞。如果只防內不防外，那又如同泥土放於露天之下，任人散種毒草，並且灌溉，施肥，得迅速發揚滋長，致於使人一觸便濫手，那就更無法救治了。

。因此我們可以將陳君的文章改爲如下，以表示我們的意思：

問題之重心，不僅在於我國是否有適合共產主義之泥土，是否有足使共產主義流行之機會；而且在俄國是否於復交後利用此泥土與機會，以宣傳共產，助長共匪。如其復交之後，俄國更可利用此泥土與機會以達赤化中國之目的，則立即對俄復交適足速中國之亡耳，又何益之有？置問題之外因而全不問，是欲開門揖盜，認賊作子，徒爲匪張目而已。吁，物已先腐，雖置於鐵匣，猶恐生蟲，奈何毫不加以愛護，任毒菌得隨處侵入，以自速其死耶？

今「我國無堅強之統一政府」，無「嚴密之社會組織」，無「穩定之人民生活」，「無控制共產主義者之把握」，即欲步伍列強，大開門戶，讓「赤色恐怖之陰謀者」自由出入，是不啻於中國泥土之上任人播以共產毒種，復

加以扶持助長，益使赤禍無法收拾矣。我國欲圖挽救，在一面內除國賊，革新政治以治其本，一面外抗強權，（抗日與絕俄均含在內）肅清共匪（共匪乃俄之便衣隊）以治其標。若不如此標本兼治，內外同顧，而欲以立即對俄復交爲揚湯止沸之計，所見不亦太左耶？（註三）（註四）

註一：陳彬蘇君的時評五篇見申報：（一）五月十二日「對蘇復交與防遏共產」，（二）同月十三日「從國際形勢談到中蘇復交」，（三）同月十四日「三論中蘇復交」，（四）五月卅日「對蘇復交釋疑」。

上海協定的詳細分析

——評汪精衛關於中日停戰協定的報告——

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國恥紀念會關於中日停戰協定有下邊一個報告（見廈門民國日報五月廿四日）

「（一）此協定是否包含有政治的意味在內，（二）此協定是否與東北問題分開。關於這兩點，兄弟可以說明：此次停戰協訂，如果含有政治的意味，即所謂以政治的條件交換日本撤兵，那必定生出喪權辱國的危險來，政府絕對不肯做

（五）六月四日再釋對蘇復交」。

註二，本篇所節引陳君的原文，俱見於以上五篇中；爲省字計，未分別註明於各引文下，爲明論旨計，所引文句均依原文，未加增刪。

註三，末段改用文言，本與本篇文體不合，而且指詞以依陳君的腔架，亦不盡如意，但爲求比照論點的異同與是非似較明白，故試爲之。

註四，本篇原定還有一節以與陳君詳細商榷前五篇時評中所舉復交的理由是否充足。以做了一個整夜（由八號晚七時到九號早七時），不能再繼續做下去。姑以本篇與陳君作初步的討論。文中所稱陳君均指彬蘇先生，並不是自稱。

丁作韶

的，幸而此點，已經避免：協定內容沒有政治意味在內。關於第二點，若我們只希望解決上海問題，而把東北問題擱置，那是一樣的喪權辱國。政府也絕對不肯做的……」

那麼，汪精衛一口肯定：

一協定沒有政治意味；

二協定並不喪權辱國。

協定果真沒有政治意味嗎？——吾以

為不但是有政治意味，簡直是政治的。

証明吾言，可從形式方面，書面協定，事實協定及其影響來說。

一、從形式方面說——按照國際公法，兩國交戰的時候（宜而後的交戰，不宜的交戰，均非所問，只須有交戰的事實。

（一）可以訂下列的協定？（一）休戰協定，（二）停戰協定，（三）投降協定。休戰協定，投降協定，其性質都是絕對軍事的事。所謂絕對軍事的事，係就軍事當局而言；他可以自由全權辦理，並且是用他們的名義。

停戰協定則不然，停戰協定是政治的（這是他與其他協定的根本區別）因為：

（一）他是兩國的外交官定的。如郭泰祺是我方的外交次長，重光日本駐華的公使

（二）他是以兩國的名義定的。如停戰協訂之上，冠以「中日」字樣。

（三）他是要兩國政府批准的。

二、從書面協定說——姑不必廣徵博引，試單就此次的中日停戰協定內容而論，完全是政治的，不過全不利於我罷了！（一）第一條裏邊的「……在上海周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敵對行為……」是政治的，是與日本有利的。

據日方軍事代表田代參謀長的聲明，停止一切及各種敵對行為句，其意義實包含便衣隊之活動及一切挑撥敵對心之言動

等。

我方默認的結果，（一）須消滅便衣隊的活動，（二）須停止一切反日的言論，反日的組織，及檢查日貨的種種行為。如此一來，日本可以很快的恢復他的地位，甚而得到比從前更好的地位。作個比方，今日中國的政府，就彷彿日本的士兵，隨時準備着壓迫中國的民衆，使中國的民衆如綿羊一般的聽日本的宰割。又假若日本是個強盜，中國的政府就是個從犯。

「停止一切及各種敵對行為」而限於「上海週圍」，是政治的，是利於日本的。因為如此日本仍舊可以繼續他在滿州的軍事行動，達到他鯨吞滿州的目的。中國政府，百般碰頭求饒，方得到上海的撤兵，對於遙遙的東三省，自然不敢再事過問。

（二）「中國軍隊在本協訂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住其現在地位，（見第二條）是政治的，是與日本有利的。因為常態二字的意義非常含混，辦法確定之權操諸日本，可以常久下去不准中國在協訂區域內駐兵，東南重鎮，不曾抓在日本手中，願意何時拿去，就何時拿去。首都夫去了門戶，將來也如甕中魚鱉，不能自救。

（三）「……鑒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點……」（第三條）是政治的，

是與日本有利的。當我方不得駐兵之時，日本得駐居於毗連地帶點，自然處於優越的地位。暫時二字也沒有確定的意思。既然在不准中國軍隊駐紮的地帶沒有中國隊伍，留少數的兵力就可以了。

（四）「……與接管之中國警察……」更是政治的，是於日本有利的。警察不過是維持地方治安的，無作戰能力，與日本的野心沒有妨碍。

綜而言之，日本之所欲者，（一）調兵撲滅東北（二）置上海於其威權之下（三）造成自由市式的上海。不過四條，已完全達到他的目的了。我之所得者，無用有損之撤兵而已。

從事實協定方面說——吾之所謂事實協定即兩方的記錄協定或兩方的諒解。

日方宣傳之諒解有三：（一）取締反日，（二）解散十九路軍，我承認調防，（三）浦東及蘇州河以南不駐華軍。

我當局對此三項堅決否認，但事實上，有極可靠的證明，誰也不能反駁。

關於取締反日——協定剛簽字，國民政府即發生一道命令，訓全國地方當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貨團體，並停止檢查日貨。北平當局奉到此項命令，即將各反日團體，停止活動。

關於十九路軍調防——據近日報登，十九路軍總指揮，被委為福建綏靖主任。

同時蔡廷楷有主闕說。廈門報也載着十九路軍調防來閩的消息。

關於浦東及蘇州河以南不駐華軍——上海二十公里之內，不得駐我國軍隊，見於記錄筆錄中的註明。如今的事實，已可十分明瞭。我國軍隊永遠不能駐紮在上海二十公里之內，侵略國的軍隊，有四區可以任意駐防，且有可以隨時可以出動的聲明。廈門民國日報，登載六月一號的京電，有一則是說中國派兩連兵駐居龍華，日人謂爲違背協定精神。這是什麼精神，明眼人不難知道。

取締反日，以恢復日本在我全國的商業地拉並杜絕將來商業發展的障礙。調換十九路軍，以隔離能抵抗日本的最大武力，上海周圍廿公里不駐我軍，以及自由市的計劃，又都是政治的，與日本有利的，我之所得，仍是上海方面的空洞無用的「撤兵」二字。

從影響方面說——協定簽字的結果，給列強一個教訓，給中國政府一個威嚇。將來，列強更怕日本，中政府更加不敢過問滿洲。「一面抵抗，一方交涉」，是汪對日的大政方針。事實上，在淞滬，是交涉而不抵抗，在東北，恐怕連交涉也要畏縮了。因此，日本便得平平穩穩的拿到滿洲，又怎能說不是政治的，不利於日本的。

以汪先生的意思，「此次停戰協定，如果含有政治的意味，即所謂以政治的條件交換日本撤兵，那必定生出喪權辱國的危險來。」雙單講來，如果停戰是以政治的條件交換的，就是喪權辱國。

上一節已經說明我之所得只是停戰，而日之所得有：

- 一、上海週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戰鬥行爲
 - 二、中國軍隊……留住其現在地位
 - 三、日本軍隊得駐紮毗連地點
 - 四、以警察收復失地
 - 五、取締反日
 - 六、調換十九路軍
 - 七、上海週圍二十公里內不駐中國軍隊
- 這都是政治的條件
以這些政治的條件，換來「停戰」二字，自然是喪權辱國，除非證明這七項不是

中國民主憲法議(六)

我們要的憲法是二權，三權，四權，還是五權？

一個國家所以需要憲法的原故，就是在規定國家的組織；要國家機關的組織和運用完善，則非分權不可。然則一個國家以內究竟有幾種權要分的呢？計有四種的主張：

政治條件。

吾並且說：這簡直是賣國賣民，是什麼道理？

(一)因爲這個協定送去了上海週圍廿公里內的主權。

(二)因爲這個協定並且要送去了東北的三省，至少是促進三省的危亡。

(三)因爲這個協定，充分表現政府是只知媚外求容鞏固個人地位的政府，民衆的與論，不在他眼裏，民衆的生命財產不在他眼裏。已在日本強權下的民衆，政府不去過問。未在日本強權下的民衆，政府又甘作日本的走狗，下什麼取締令！

這種賣國賣民的政府，非澈底推翻，中國只有滅亡。望反對派大聯合，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打倒他。

六月二日

徐漢家

一、二權分立說

二權分立說的產生，因爲各國於應用三權分立制度以後，發現一種「制衡原理」，立法機關不僅限於造法，行政機關不僅限於執行司法機關不僅限於裁判，因此既不能說是三者互不相屬，然而原則上立法行

